

目 录

◆ 绪论	1
第一章 两汉以前及两汉、魏、晋的考古学	7
第二章 南北朝、隋唐的考古学	23
第三章 两宋的考古学	39
第四章 元明的考古学	65
第五章 清代的考古学	83
第六章 20世纪上半叶非中国正式考古机关的考古工作	135
第七章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考古机关的考古工作	151
◆ 跋	167

—

先父阎文儒（~~1914~~ 1914 年），字述祖，又名成凡，辽宁省义县人。他自幼酷爱读书，二十岁投考东北大学，在数百名考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一。1936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向达教授。在三年的学习中，他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写出了长达二十余万字的《西域文明史》，受到向达教授的高度评价。1939年，先父到西安调查长安城，并用了两年的时间写出了《西京胜迹考》一书，这是先父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

1938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向达教授任考古组组长，夏鼐任副组长，先父为组员。考古组于 1938 年到达敦煌鸣沙山发掘唐墓，暑期至莫高窟考察，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秋后，继续发掘唐墓，并详细调查了阳关、玉门关、汉长城、安西榆林窟和唐代的玉门关等，年底返回西安。1939年，先父又与夏鼐先生至酒泉、张掖、武威等地，调查了张掖南山下的石窟，还在民勤县发掘沙井子新石器时代遗址。此次河西考古，正值抗日战争艰难

时期，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探访祖国的文化宝藏，为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54年，为了纪念释迦牟尼诞辰两千五百周年，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对房山石经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先父和原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黄炳章先生等参加了这一举世瞩目的考古工作。他们清理了雷音洞，打开了另外八座封存多年的藏经洞，共取出四千余块隋唐时代刻的经板。1956年夏，先父和黄炳章等人根据一座辽碑的记载，在已毁坏的南塔周围挖掘，在塔南发现了深五米，埋藏六层经碑的地穴。他们按照经碑排列顺序编号，再抬出拓印。经清点，有一万余块，比碑铭上的记载多出一倍以上。经后来考证，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契丹藏》。先父在将近两年的房山石经考古发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许多报刊对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作了报道。

1958至1959年期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先父投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历代诸馆的布置陈列工作中。他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半个多月才回家一次。国庆前夕，周恩来总理来到历史博物馆视察工作，当他看到康熙和乾隆的画像时问：“你们从这两幅画像里能看出康熙和乾隆有什么区别？”先父回答道：“康熙重武功，乾隆偏文治。”总理指了指两幅画像说：“你看，康熙的画像侧面有书架，架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书，乾隆画像侧面也有书架，架上放的却都是古代瓷器。可见康熙励精图治，乾隆贪图享乐。这才是他们的区别。”

二

先父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贡献，莫过于对中国石窟寺艺术

的研究和总结。

从 1951 至 1953 年,先父接受锡兰国(现斯里兰卡)的邀请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了编写《佛教百科全书》中的“中国石窟”部分,率全国石窟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行程三万余里,先后三次对全国的石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第一次调查从 1951 年 10 月开始,调查了新疆各石窟(包括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和克子里喀拉罕石窟及库木吐拉石窟群、焉耆七格星明屋石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等),甘肃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四川广元皇泽寺石窟、大足龙岗山石窟,浙江杭州飞来峰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等。此次调查历时一年半,弄清了不少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对过去根本不被人们注意的石窟进行了分期、编号、造册、登记,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1953 年以后,先父又率调查组两次前往甘肃炳灵寺石窟、陕西庆阳寺沟北石窟、郴州大佛寺石窟等地进行了调查,这是对第一次调查的进一步核实和补充。可以说,调查组对全国石窟寺的三次调查,是我国现代考古事业的一次壮举。它不仅为编写佛教经典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也是对我国石窟寺艺术的一次全面的整理和总结。同时,对于我国石窟寺的保护,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

先父生性忠耿正直,不畏权势,有强烈的爱国心。抗战胜利以后,先父应恩师金毓黻之聘赴沈阳,任沈阳博物馆主任、东北大学教授、《东北民报》主笔等职务,在东北文化界享有很高的

声望。对于那些受国民党反动当局歧视和迫害的爱国知识分子，先父都给予深深的同情和慷慨的帮助。1945年春季，先父在《东北民报》上发表《端午感言》，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贪污腐败等罪行。后来，先父又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将其秘密转送到当时已经解放的大连市。全国解放前夕，先父毅然回绝了海外高官厚禄的诱惑，愉快地接受了向达教授和汤用彤教授的聘请，飞回北京，任职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全国解放以后，先父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考古人才。“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父和许多学者一样，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心一直不变。1976年，当他从“江西干校”返回北大校园时，我们问他对所受的迫害就没有一丝怨恨吗？先父感慨地说：“我是一个通晓历史的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要经历一个磨难的过程才能达到太平盛世。就像我当年坠入黄河，如果我不能在惊涛骇浪中奋力拼搏，那就不能到达安全的彼岸。”先父这番话，至今依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先父做了一辈子考古工作，在不少单位做过负责人，国家财产他锱铢不取。中国书店的著名古籍版本专家郭纪森老先生多次对我们讲：“我和你们父亲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太了解他了，那真是两袖清风呀！”

1976年，先父不幸患颈椎增生症。1977年夏季经过手术，先父的病基本痊愈，但右手失去了写字的能力。他丝毫未丧失继续执笔的信心，就在他六十五岁之际，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不到一年，先父左手写出来的字同右手写的一样工整有力。以后，先父就用左手坚持写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共出版了《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唐代贡举制度》、《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两京城坊考补》、《龙门石

窟》等著作。

先父把他毕生的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的考古事业，他那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考古事业中的一份宝贵的财富，他对考古事业的执著追求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正如北京大学考古系张辛教授的挽联所言：

石窟考古，交通中西，百卷著述昭史界
泮宫滋兰，披沥光霁，一园桃李发寰中

这副挽联概括地表述了先父在考古事业中取得的杰出成就。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在繁荣祖国文化事业的道路上前进。

一、什么是考古学史

根据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科学,就是考古学,因而中国几千年来对各样铜器铭文形制的研究,对石刻文字的研究,对书、画、雕刻的研究,对钱币的研究,对玺印文的研究,对生活用具(劳动工具、武器、装饰品、器皿等)的研究和古遗址(城市或村落)古建筑的记载与研究,以及近代有计划地对遗址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凡是以上提出各种记录与研究的著作,都是考古学史的良好资料。我们考古学史的范围,既不限于旧日的金石学,也不限于近百年来发掘报告,历代对于物质文化遗存的认识和重视、收搜和保护,也都应列入考古学史的范围以内。

二、中国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

考古学的发生必定要以史学为基础,有了史学才能谈到有考古学。孔子是汉代以前杰出的大史学家,因而他能到杞、宋调查夏、殷的文明,认识古器物坟羊与楛矢。司马迁是汉代的大史

学家,他也能探禹穴、窥九嶷,以至学习古文字。史学的发展,促使考古学的发生,考古学的发生,又可促进史学的发展。

一、宋代以前的考古学

除掉两汉以前考古学启蒙时期还谈不到正式的考古以外,两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前期两汉的考古学,主要是对古文字(古文学派)的研究,用以解说经史,而不重视古器物(这并不是说考古学放弃了古器物的研究)。后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考古学,学习古文字成为创作书法的必经之路,古器物和书画收藏的人也比较多,开始有了货币的价格(如梁萧之遴收藏古物、唐太宗购买书画),于是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渐渐兴起来了。与前期的考古学有了一些不同。当然对古遗址、古墓的调查与研究,前后期都是一致的。宋代以前的考古学所以有前后期的不同,应当认识到当唐代或唐以前社会的商品生产并不盛行的时候,古器物没有价格,所以唐以前的考古学家,没人重视古器物形制的研究。唐代以来,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的盛行,古器物和书画有了价格,官府和私人都注意收藏,因而对古器物有了鉴赏和辨伪,张彦远的两部书画考古著作《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就是对古书画鉴赏辨伪的总结著作。这样势必过渡到宋代的古器物学和金石文字学的考古学了。

二、宋代和宋代以后的考古学

唐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初唐时候已有技巧之家,专

事铸造佛像。^① 北宋以来,由于宣和“内府尚古器……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吴玠为光州固始令……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②。这样古器物成为商品,私人收藏者渐多,于是古器物图录之学、古文字学大兴。南宋翟耆年《籀史》中注录北宋古器物图录和钟鼎款识之书三十四种,可以说明唐代以后专为古器物而研究是如何发达了。有清一代,金石之学又大兴,论公私收藏,竞作图录和释文,同时对砖瓦文字、古玉、古镜、印玺、钱币等都有专书来讨论。其他如书画的记录与研究也有所发展。所以清代金石考古的盛行与当时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盛行是有关系的。当然也有许多考古家所做的工作,如宋敏求的《长安志》、迎贤的《阿翔访古记》、萧洵的《元故宫选录》、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等,更接近于史学,而与古器物研究这方面的关系比较少。

獠伴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考古学

自 19 世纪下半世纪以来,西方列强不仅在我国发展垄断资本,扼杀中国的经济,在政治上奴役中国人民,同时也发挥他们的反动社会学理论,提倡“文化圈论”,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不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因此在考古学上,也不能放弃他们的掠夺行为。他们的学者,纷纷到中国北部蒙古(含现在的蒙古国),西北新疆、甘肃,东北各地方作调查或发掘工作,并窃盗了许多宝贵的文物。西方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如桑志华、怀履光等人,受

① 《广弘明集》,卷二十八,《断卖佛像敕》。

② 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

中国聘任的安特生等人以及日本的鸟居龙藏、八木奘三郎等人，也都做了许多考古工作，后来和中国学术团体合作的斯文·赫定等人都把西方的考古学传入中国，因而刺激了中国从宋代沿袭下来的古器物学、金石学研究的发展。开始接受西方先进研究方法的是清末陆心源、吴式芬等人，用泰西摄影法，印古器物图录。继之而起，有卓越成就的是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他们在中国金石学的基础上，又应用了西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罗、王的成就在清代一切金石学家之上。1904年以后，以李济为领导的考古学不仅应用西方考古学的方法，同时也配合中国金石学、考掘学的方法，使考古学大大地前进一步，给今天考古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新旧考古学的区别

旧考古学的优点和缺点

旧日的考古学，可分为两方面来说：一是中国宋代以来占考古学重要地位的金石学（这并不是说没有对古器物形态分类的比较学）；一是受西方考古学影响的古器物形态分类比较学（也不是说放弃对古器物文字的考证）；另外就是以历史、地理为纲，对逸闻逸事的调查与考证。

这样的旧考古学，它的优点是：金石学能把古器物、古文字考证出它本身的渊源流变，古器物形态分类比较学能应用科学方法联系发掘出土地层、位置以及用科学的分类来作研究，较金石学方法更进一步。至于以地理为纲，调查考证历史人物活动

的遗迹,用以说明某一历史问题,也是很好的考古方法。

缺点方面 金石学只是孤立地对古器物、古文字本身的考证与研究,即使能对研究中所提出的历史人物得到一些活动材料,但对全面社会发展的概况,不能联系起来研究,不能更多地说明人与物的关系。近代考古即使作了科学的发掘,虽然是进步的,但在思想上还是期望得到稀世瑰宝,而不重视得到更多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资料,甚至仅希望在部分遗址中,得到某一些贵重文物,因而忽略了当时全盘的社会生活面貌。在古器物形态分类比较学上,只根据器物本身来进行比较和研究,虽然这样比较,在考古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可是器物的制作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的,尤其是与社会中的人,更是不可分开的。如果离开了社会和人,专从器物本身来比较,只能反映器物发展的一面,忽略了器物为什么被人制造出来,这样势必脱离人与物的关系,脱离历史发展而独立成为古器物学,不能借以恢复历史的原貌。以上所说的考古学,当然不能反映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也不能反映社会的生产关系。

■ 新考古学要怎样来建树

在社会性质的改变中,考古学也同样有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突如其来,而是在旧基础上取长补短发展出的新形式)。在今天,考古学的变化还是很少的,如果要建树起新的考古学,首先要纠正过去专在古文字、古器物形态上下功夫的做法。专在古文字上研究,不重视周围的物质资料,很容易考证错误,歪曲历史事实;专在古器物上研究,只可对古器物本身有认识,不能把制造古器物和应用古器物的人与周围的关系了解得

更多一些。在考古发掘上也应当对遗址全面地打开，作综合的观察而不应只凭几条探沟的开掘，征集一些材料，就代表全部的文化。考古学与历史，虽然有某些部分的不同，但整体来说，还是要一致的。因此新的考古学，要用若干例证指出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的相互关系，用以说明历史，解决历史上的若干问题。

一、两汉以前的考古学

考古学的兴起,既然以史学为基础,那么最早的考古学家虽然不像后代那么多,但发凡起例的工作,见于文献的,当在春秋之际。

孔子与考古学

据文献的记载,孔子不仅是个史学家,而且是个考古学家。他的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①以至“约史记而修《春秋》”。这些著述内容,许多地方涉及考古的资料。不懂考古,没法得到这样卓越的成就,当然孔子周游各国的经历,也更丰富了他的考古学知识。他对古器物的认识,还是十分渊博的,如对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

^① 《尚书·孔氏序》。

羊”的器物，孔子称作“坟羊”。“有隼集于陈侯之廷而死，楛矢贯之，石弩其长尺有咫。”孔子说武王克商时，“肃慎氏贡楛矢、石弩，其长尺有咫”，因证楛矢石弩，是肃慎的兵器。^①虽然孔子认识古器物还不够正确，但他已经懂得了许多古器物知识，甚至如居鲁入太庙问欹器于守者^②的研究古器物等纪实，都应是孔子为研究史学而对考古工作的重视。

■ 韩非子的考古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许多学者都要用历史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学说。韩非子也是当时的考古学家。他知道“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鬯……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斲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又说：（殷人）“食器雕琢，觴酌刻镂，四壁垺墀，茵席雕文。”又说：“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墙之，有楛高至于丈。……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③当然这些记载也可能是根据传说，但如此记出，一定要有相当的调查与研究。

其他如孟子、荀子、吕不韦门下诸行生，虽不像孔子那样博闻通古，但也都能相当了解古代劳动文化的遗存。

① 《国语·鲁语下》；《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卷四，《辨物》。

② 《论语·八佾》；《荀子》，卷二十，《宥生》。

③ 《韩非子》，卷三，《十过》第十。

獠屈原的美术考古

《楚辞·天问》应是一篇具有相当美术考古价值的著作。屈原看到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中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和古圣先贤的壁画,不由愤懑,为愁思而写出该文,但从天地开始,经日月星辰的安陈,直到传说时代的洪水,鲧、禹的治水,尧、舜的治国,益后的作后,夷羿的革命,少康的复国,汤武的革命,桀、纣、幽的荒淫,齐桓的作伯,吴王的散亡等等娓娓道来。对这些壁画的解释,已达到了美术考古的目的。

灋《世本》对古器物的记录

《世本·作篇》中,记录了各样古器物及创造的人,如:“倕作钟,母句作磬,女娲作笙簧。……箫舜所造,逢蒙作射,杼作甲……咎繇作耒耜……”虽然这些记载,不见得是专对古器物的研究,但在先秦时代,有这样对古器物的记录,也应是最有价值的文献。

二、西汉的考古学

汉帝国统一以后,社会秩序渐渐恢复,社会生产力一天天地向上发展。农业上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水利灌溉有相当的发展,手工业如盐、铁、鼓铸等也有很大的进步,刺激了商业的繁荣。文化方面也日渐上进,史学上对各种资料的搜集,都超过以往。史学的发达,促进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古文经的研

究,在古文字考订上起了大作用。直到后汉,古文学派始终坚持着进步的学风,成为两汉时期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二 司马迁的考古工作

自孔子作《春秋》以后,史学日渐发达,到司马迁时更能把史学发扬光大,因而他的考古工作,也是最有成绩的。分析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 对古遗址的调查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蒙恬列传》中云:“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湮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又云:“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同时又调查信陵君食客侯嬴在大梁任夷门监的夷门地址。《史记·信陵君列传》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司马迁又到楚调查了春申君的故城和宫室。据《史记·春申君列传》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他又调查了秦始皇东巡狩猎所祀的八神祠的遗址和长安以西几十个神祠的遗址。这些考古活动均散见在《史记·封禅书》所记文中。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

(二) 对古墓葬的调查

为《史记·周本纪》太史公曰:“周公葬我于毕,毕在镐东南

杜中。”又如调查秦王由襄公起到始皇二世历代的陵寝^①、谷城项羽墓^②、箕山许由墓^③、大一顷孔子冢^④等遗迹。他还到淮阴调查韩信母亲冢^⑤，在长安调查橐里子墓（见《史记·橐里子列传》）等等。

③ 对古器物、货币的研究

司马迁过鲁曲阜，研究“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衣冠、琴、书”的古器物^⑥。太史公又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为上币，铜钱只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⑦

④ 对古文字的研究

孔安国是西汉古文学派的大师，司马迁曾从之学《古文尚书》^⑧。太史公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⑨因知春秋古文，也是很早就为太史公所认识到的。

⑤ 对逸闻逸事的调查

如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

① 《史记·秦本纪》。

② 《史记·项羽本纪》。

③ 《史记·伯夷列传》。

④ 《史记·孔子世家》。

⑤ 《史记·韩信列传》。

⑥ 《史记·孔子世家》。

⑦ 《史记·平准书》。

⑧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孔安国传》。

⑨ 《史记·吴太伯世家》。